

孫中山革命奮鬥小史

目次

一、由改良主義思想出發……………	(二)
(一八九四年前)	
二、興中會時期……………	(一一)
(一八九五——一九〇五)	
三、同盟會時期……………	(二一)
(一九〇五——一九一一)	
四、脫出袁世凱的圈套……………	(二九)
(一九一二——一九一六)	
五、痛苦的摸索……………	(四三)
(一九一六——一九二二)	
六、勇敢地跨前了一步……………	(五四)
(一九二三——一九二五)	

孫中山的一生四十年的政治鬥爭與革命的歷史至今仍舊是中國人民所應該從中學習的。但是假借着中山名義的中山叛徒的一切做法却妨礙了人們來認識和研究孫中山。他們一方面以掛羊頭買狗肉的行爲來侮辱了中山，損害了中山的信譽；另一方面，他們又企圖把孫中山描寫成一個「神」，不讓孫中山一生鬥爭的真實發展史和世人共見。

這本小書只算是筆者對於中山的思想與實踐的發展過程的初步研究。我們將嚴格地根據事實來從侮蔑與歪曲之下顯露出中山的真面目來。我們將指出在中山的一生奮鬥過程中每一時期的特點及其中所包含着的弱點，指出怎樣的歷史條件形成這些弱點，并指出他怎樣地擺脫和克服這些弱點，更指出他怎樣地用他一生的奮鬥的發展過程來指明了中國革命的方向。我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夠見到中山的真精神和他的真實的偉大處。

一、由改良主義思想出發（一八九四年前）

孫中山自己曾追溯其鬥爭史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孫文學說第八章）乙酉年是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其時他是二十歲的青年。

就中山一生歷史發展看，我們可以說，他在二十歲時，受中法之戰的刺激，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覺悟，他的一生革命鬥爭即由此開始走第一步。但如果說，從一八八五年開始，他已有了明確的革命思想，却是不符合事實的。

研究中山傳記的國民黨員們都竭力想把孫中山寫成簡直是初出娘胎就抱革命大志，而一成不變地繼續到死。——這其實倒是侮蔑了孫中山。

嚴格地說，應該指出，到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之戰後，孫中山才有革命思想的萌芽，在一八八五——一八九四間，他在基本上還是個改良主義者。而且在一八九四年後，改良主義思想也並沒有立即洗淨，直到一九〇五年左右和康梁保皇黨堅決分裂後，才表

現出較明確的革命性來。

這樣的發展是和當時中國整個情勢的發展相符的，由此也正可以顯出孫中山是能够而且敢於和時代一起進步的。

孫中山於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生，在珠江三角洲的一個村子裡。一般的傳記都說，他的父親少年時因『家道中落』曾赴澳門做裁縫，後仍回鄉「業農」。就其家境看，大概是屬於富農的地位。中山在十三歲以前一直在家鄉（香山縣的翠亨鄉）讀書塾。他的哥哥孫德彰已赴檀香山做工經商，漸漸地發了財。中山在十三歲時（一八七八）也去檀香山（那時還未成爲美國屬地）。在那里住了五年，攻讀於英國基督教會所辦的小學校和美國教會所辦的高等學校。一八八三年回國，又到香港進拔萃書院，次年轉入皇仁書院。當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時，中山仍在香港政府所辦的這個『書院』中攻讀。

由此可見，中山在少年期間，受封建傳統的教育影响甚少。所受的是西方國家爲殖民地人民所辦的教育，由此，他接受到了以後他要開三十多年的努力才能洗淨的壞影响，但也由此他較早地接受了與封建思想對立的近代科學思想。他又在一八八三年在香港受基督教洗禮。

中法戰爭的失敗在中國社會中所激起的影响是很巨大的。因爲在中法戰爭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支配和控制雖然業已建立，但滿清政府一面竭力採取敷衍和討好外國侵略者的政策，以求相安無事，一面辦理其所謂『洋務』，買機器，設工廠，買槍砲，建立新式海陸軍，……以此來欺蒙人民，使人民以爲雖然現在還不行，但一旦『洋務』辦好，國家就能臻於富強了。——不料一八八五年的戰爭突發，把這個『洋務運動』的紙老虎毀了一個大洞。

在一八八五年後，比堅甲利兵的洋務運動較進一步的改革思想漸漸興起。受時勢的刺激，有一批士大夫知識分子開始要求政治上的改革。但他們並不和滿清封建統治勢力相對立，所以還是屬於改良主義的範疇。康有爲是這類人物的代表，他在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書皇帝，提出維新變法的主張。

孫中山在中法戰爭後一年（一八八六）到廣州博濟醫院學醫，繼又轉入香港的雅麗醫學院。這個醫學院是受了英國教育而在香港當『狀師』的何啓私人所辦。何啓在一八八七年寫過本小冊子，猛烈攻擊滿清政治，認爲中國必先修內政使國內有『公平』，然後可以『得民信』，『得民心』，『得民力』，然後可以不怕『外患』。——這也正是

當時國內較激進的改良主義者的看法。

醫學的研習消磨了孫中山的五年時間。既是在廣州香港兩地，要認識當時中國的時局和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并接觸國內正在醞釀着的新思潮，自然不是困難的事。

一八九二年，二十七歲的孫中山從雅麗醫學院畢業，成爲一個正式的醫生。他先在澳門，然後在廣州行醫。但這個年青的醫生顯然不滿足於做人體的醫生，而有志於做中國的醫生。一八九三年，他和他的朋友陸皓東由廣州過上海而到天津。這次出行目的主要是在游歷呢還是在謁見北洋大臣李鴻章，——我們已不清楚。有一種傳說：中山這時面見李鴻章勸他贊助革命。這個傳說完全靠不住。流傳下來的孫中山上李鴻章書足以證明，直到此時，中山的基本思想並不是革命。

在這封上書中，中山提出的基本主張是：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畧，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維堅船利砲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這樣的主張和同時期的康有爲上皇帝書實在沒有什麼兩樣。比封建官僚的洋務論雖進了

一步，但仍是承認現行統治秩序的改良思想。

國民黨的一些所謂『黨史專家』企圖証明上李鴻章書中已包含着中山一生的革命思想，那其實倒是侮蔑了中山。

中山一八九三年上書李鴻章，顯然的決不是爲了『革命』，而是爲了——如同從來的中國讀書人一樣——求知於當道，他的信中說：『推中堂（指李鴻章）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中山自稱）者，亦當在陶冶而取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駑下而求知於左右。』書中又說明他個人的計劃是想特別致力於農業，擬先赴法國及其他各國考察，然後再回國考察各地，『深望於我中堂玉成其志』。

李鴻章却一點也不重視這個『上書』的青年。當時的中山顯然是爲此而感到失望。但在我們今日看來，倒應該覺得慶幸了。中山在封建統治者面前的碰壁使他開始轉回頭來。

但也不能以爲只因這一次碰壁，即造成一個革命領袖。中山在廣州和香港讀書期間，所熟識的朋友有三合會組織中的重要分子（鄭士良等）。三合會是下層人民中的秘密結社，『反清復明』的傳統思想在這時還相當強烈地繼續存着。中山自身的封建士大夫的傳

統觀念既極淺，又加上農民中的自發的革命性的影響，這是使得中山能夠很快地由上朝廷的路回頭走向人民間的基本原因。而且就在他上書李鴻章後一年，又發生了比中法戰爭更加巨大的震撼——中日之戰。

當中日之戰在一八九四年八月爆發時，中山已從國內又到檀香山，并在檀香山第一次設立了他所領導的組織——興中會。在檀香山的『興中會章程』中強烈地表現着在被侵略的嚴重危機下的愛國主義情緒，而且對於滿清統治者採取了攻擊的立場，有『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庸奴誤國，荼毒蒼生』這樣的說法。這時入會的只有二十多人，大半是經營小商店和小農場的僑民。

但僅僅責備當道，並不就是革命。一八九五年，他由檀香山回香港廣州，和會黨合作，準備以武力進攻滿清統治者，被滿清官方目爲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他才決定地轉到了革命的方向。

在一八九六年孫中山曾經在一篇原稿用英文寫的文章中自叙他反滿清的革命思想的由來：

余早年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之存在。此種運動大可名之曰少年中國黨之形成。余以該黨識見宏遠，適合時勢，深表同情，即報名入黨。蓋爲國利民福計，極欲有所盡力耳。該黨原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推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舊式專制及腐敗之政治。……中國睡夢至此，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少年中國黨之所由設也。該黨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原冀皇帝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敝或可奮起。且近年以來北京當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團接觸較近，其於外國憲政當必畧有所知，或能贊助人民此項運動。以是余及其他同志奮然本利國福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但結果反令多人嚴厲懲罰。時則日本正以重兵進逼北京，在吾黨因欲利用此時機，而在朝廷亦恐以懲治新黨背全國人之心，遂暫擱不報。但中日戰爭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於上書請願者如此叱責，且云，此等陳請變法條陳，以後不得擅上云云。

吾黨於是慨然長嘆，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這一段說明是極其重要的。

對於這一段話，有幾點是必須說明的：

第一，所謂「余早年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之存在」，這應該是指一八九二年他在澳門短期行醫之時，因為在此以前他並沒有到過澳門。這種要求「發之自上」的和平的漸進的改良主義運動，很顯然的，就是指康有為所領導的政治運動。康有為並沒有組什麼政黨，所謂「少年中國黨」不過是孫中山在寫文章為便於外國人懂得而提出的說法。因此所謂「深表同情，報名入黨」無非是取得若干聯系而已。中山在開始反滿革命行動前和康派有怎樣的關係，我們已不清楚。但中山在由澳門轉到廣州行醫後一年即北上謁李鴻章，這一年康有為也正在廣州萬木草堂講學。後來雖中山脫離康派影響，提出反滿革命宗旨後，康孫兩派之間也還多次接洽合作。

第二，康有為在一八八八年已曾單獨上書皇帝，到了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和議將成時，他又在北京組織『公車上書』。中山在這裡所說『會合全體，聯名上書』顯然就是指這件事。照中山的說法，似乎他也曾參與其事，那却並不是事實。但由此可以表明，中山至少是贊成這種上書的舉動的。這裡所說，『近年以來北京當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團接觸較近……或能贊助人民此項舉動』，也正可以解釋他在一八九三年上書李鴻章的動機。

從贊助康有爲的改良主義立場，走向反滿的革命立場的轉變，在中山以後的自敘文章中未再提到過；國民黨的黨史專家們也竭力否認這點，以爲如果肯定這點，就使他們的『先總理』大爲損色。其實這樣的發展從整個歷史背景是很自然的，而且中山能够在一八九四的中日戰爭後，立刻開始轉向革命立場，正足以顯出他的偉大來。康有爲梁啓超一班人同樣受到在統治者面前碰壁的教訓，雖至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後，仍堅守保皇黨的基本立場，不能再前進一步，兩相比較，孫中山之爲偉大革命者，並非偶然。

但由上列這段話也可看出，中山在一八九五年後，也不是立刻轉到澈底的革命立場。他沒有能馬上看出，革命立場和康梁的改良主義路線是堅決對立的，而只是說，因爲和平手段無效，所以不得不把原有的改良主義路線『稍易以』使用武力的『強迫』的手段而已。

二、興中會時期（一八九五—一九〇五）

方在中日戰爭和議未定之時，中山回到了香港。和楊衢雲、謝纘泰等人所組織的輔仁文社合作成立了興中會，準備乘滿清政府潰敗乏和後威信極度低落時從事武裝起義。楊、謝都是受外國教育的僑民中的知識份子，他們的輔仁文社於一八九二年成立於香港，在三合會中頗有號召力量。以羣衆力量講，他們當時實超過中山，所以在港成立興中會時，楊衢雲被推爲會長。然而中山仍爲會中有力籌劃者。他自己到廣州組織農學會做爲他們的機關。八九月間，他們的武裝起義計劃已大致完成。但滿清官員發覺了，他們秘密運港的槍械被查出，在廣州的同志多人被捕，中山自己幸能逃出。——第一次的革命起義就這樣失敗了。

滿清當局自經歷過太平天國的大革命後，帶着萬分恐懼的心理嚴防人民造反。這回知道起事的首領中有洪秀全的同鄉，基督教徒洋醫生，更加覺得非同小可。在緝拿中山的官文書中把他的名字寫做孫汶，表示這是洪水猛獸一般可怕的人。這時滿清政府對於

外交雖然辦不好，但海外特務工作却已學會了。一八九六年他們查訪到中山到了倫敦。原來中山自廣州失敗後，即由香港奔赴日本，再轉檀香山而至美國，又於一八九六年十月到英國。在倫敦，他被滿清官員設計誘騙入使館。幸虧他的英國朋友在外營救，得以釋出。經此事件，中山在在國外的聲名倒更加提高了。

這回中山在英國住了一年多。這時，他接觸到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使他在民族思想外，更堅定了民主的信念，并且把社會改良主義的成分也包含進他的革命思想中。在海外流亡各地時，他到處進行組織和宣傳的工作，得到一小部分僑民的商人和工人的擁護。這時中國留學生還極少。一八九八年他又到日本。這時在日本雖有華僑萬餘人，但贊助他的主張仍不過百餘人而已。至於在國內，他的影響更微乎其微。這還是康有為的全盛時代。

康有為在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維新』期達到了他的成功的頂點，八月政變，一交捧下來，也只好逃到日本做流亡者。這時孫康兩派曾在日本人的媒介下，進行過合作的商談，終因康派的驕傲而不成。這種合作的不成，如同他上書李鴻章的碰壁一樣都是好消息。因此他仍致力於從國內各地會黨中開展羣衆基礎。一八九九年，長江各地會黨和兩

廣福建會黨（包括三合會，哥老會等）漸漸地都受他的聯系，參與興中會的組織。

一九〇〇，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滿清政府逃亡西安，舉國震動。中山覺得這是一個開展運動的好機會。他由日本到香港，起初他是在英國方面授意下，企圖說動這時當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共同『革命』。這個計劃沒有成功。他的老幹部鄭士良却在廣州惠州率領會黨力量發動了一次武裝起義。雖然堅持了半個多月後也因孤軍作戰而告失敗，但這次起義却得到了廣泛同情。因為自經康有為的改良主義運動的失敗教訓，又經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之役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昏庸無能，連知識分子中也覺得滿清政權並不是值得保留的東西了。所以孫中山自己說：『當初次之失敗也（指一八九五年的失敗），舉國輿論莫不目予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咀謾罵之聲不絕於耳。……惟庚子失敗之後（指一九〇〇年的惠州之役），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

惠州發動時，中山自己在台灣，失敗後，他又開始他的奔波流亡，由日本到安南再到檀香山而赴美洲，又轉至歐洲。這時國內，在帝國主義列強支持下，滿清政權又重新穩定起來。牠向人民作了各種改良政治的諾言却無一能實現。這更使海內外中國人民憤慨。反滿清的愛國思想和反專制的民主思想漸形普及。繼惠州之役後，其他各地，特別在

廣西省的自發的農民暴動與起義陸繹不絕。海外流亡的孫中山這時發現在他所過之處，他的革命思想已能取得衆多的同情者了。一九〇四年，他在美國報紙上發表了一篇『中國問題之眞解決』，宣稱：『全國革命之時機刻已成熟，……中國人民中有衆多高士能才，足以發起此創造新政府之工程，使此末日之滿清君主變爲一「中國民主」。……今中國可謂爲全國大運動之除夕，只須星火，便可燎盡政治之原，驅逐滿人出吾人之土地。我人之工程雖巨，然決不至莫抵於成也。』

一九〇五年，中山在歐洲留學生中組織了『革命同盟會』，由此他的革命運動又向前跨了一步。

這樣看來，中山在一八九五——一九〇五這十年間誠然是走上了與滿清政權相對立的革命道路，但我們更須指出，在這十年間并不是沒有弱點的。應該指出下列三點：

第一，在這十年中，中山的反滿革命運動的羣衆基礎是相當薄弱的。他把一個最雄厚的反封建的羣衆力量——農民忘記了。試把孫中山和在他之前的洪秀全對照一下。洪秀全雖受過封建的傳統教育，却能在開始他的革命運動時，即深入到農民中間，在窮鄉僻壤中埋頭努力，把農民力量組織在一個有異於舊式會黨的較新組織中。因此一旦起

義，就能立刻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形成驚天動地的力量。但孫中山却一開始就只在城市內活動，而當時在城市內還缺少新式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群眾力量，他只能利用舊有的會黨來做他的革命運動的基礎。固然，孫中山在後來的發展中遠遠超過了洪秀全，但是在其初期的群眾準備工作中是并不如洪秀全的。

一八九五年的廣州起事，在客觀、主觀條件上都極不成熟，即使不是偷運軍械被官方發現，也必不能有成就。過早地玩弄暴動，以致他只好出亡國外，雖然在國外從僑民和留學生中得到了支持，但更加疏遠了在國內廣大羣衆中的思想和組織工作的準備。一九〇〇的惠州起事仍舊是只憑會黨力量的孤立的軍事冒險。

三合會，哥老會一類的會黨組織，其基本羣衆中包含着農民與城市貧民的成分，保有着自發的革命性，但是其思想原則和組織方式究竟是封建落後的；而且其中上層分子往往已不屬於勞動人民。中山在廣州香港所接觸的會黨分子有些是買辦性的人物。

（如楊衢雲曾在港任新沙宜洋行副經理）中山自己固然是沒有被限制在會黨式的低級的革命性中，由此繼續前進，漸能取得更進步的革命思想；但是他沒有能在會黨以外建立革命羣衆基礎，反過來改造會黨組織，以致受會黨中的封建落後性所限制，這樣的弱點